

黄金的开采困扰着巴西卡亚波印第安人

〔美〕瓦内沙·利

巴西的卡亚波人把所有的非印第安人都称为“库本”。在金矿工人来到卡亚波人保留地以前，其他的外来者早已侵占了他们的土地。这些人是橡胶工人、巴西坚果采集者和猎人；随后而来的是擅自占地的人、农场主、农业工人、伐木工人和土地投机商。卡亚波人与所有这些外来者都进行过斗争。

我很了解这段历史。在里约热内卢的联邦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期间，我曾经在巴西亚马孙河流域东部的兴古河畔，与卡亚波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了13个月。现在，我又和格罗太尔村的卡亚波人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村子距巴西北部边界约300英里。卡亚波人欢迎我去，因为我会说当地的土语，也了解他们的习俗。

与森林地带的其他村子相比，格罗太尔是一个约有90间房屋的大村。它的设计是传统风格与现代特征的奇妙结合。按照巴西政府有关机构（这一机构的成立先于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规划，某些村民，如卡霍恩克和象他一样的首领托托伊，都居住在“主要的街道”上。这条街道宽敞，位于弗兰斯科河与传统的男人房屋之间。其他人住在这条街的岔道上。村子里有一部分仍保持着传统的设计：在低矮的峭壁下有一大圈房屋。

格罗太尔印第安人保留地包括的实际范围要比以格罗太尔命名的那个村子大。在官方文件上，它是仅次于图姆库马克和兴古国家园林的巴西印第安人第三大保留地。前两处保留地总面积为2,738,850公顷（10,575平方英里）。和巴西许多印第安人居住区一样，格罗太尔保留地也被划出了地界。在总

数约3,000人的13个卡亚波村庄中，有5个位于这一保留地内。

卡亚波人一直以他们的战斗能力而自豪。在白人到来之前，他们袭击敌对部落，在内部也曾有过一些冲突。他们以棍棒和弓箭为武器。

一位老战士回忆往事说：“那时，我们都住在男人的屋子里，防备敌人侵犯村子；我们还计划着怎样去袭击敌人。可现在，那些青年却更愿意和妻子儿女们呆在家里。”

卡亚波成年男子及其好斗性格的传统象征是直径为6公分左右的一个很轻的木制唇盘。它和阴茎护套都是男子的日常装饰。一个青年男子说：“那种护套使人感到不舒服，现在，我们都习惯穿短裤了。”他还补充说，那种唇盘也不再招人喜爱了，“当你带着它时，就不能讲葡萄牙语。”其实卡亚波人几乎没人能懂葡萄牙语，但这样说可能是某种自我感觉。和外来者的接触，已促使唇盘成为过时的装饰，尽管仍然有一些老年男子佩戴。

现代成年男子最基本的象征物可能是一支枪。这些枪，有的是通过交易，用和平手段得到的，但多数是在袭击中得到的战利品。他们的枪支用于狩猎，有时也用于战斗。

现在的成年男子甚至又有了更新的象征物，例如：录音机。在卡亚波人举行的各种仪式上，越来越多的男人手里提着录音机，使歌手们伴着音乐演唱，也录下人们的谈话，反复收听。

卡亚波人和许多其他的部落一样，正在探索白人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的奥秘以

及不计其数的绝妙物品的来源。他们也逐渐卷入了开采巴西金矿的热潮之中。他们把外来者从保留地内的一座矿井里撵走，并把矿井重新命名为盖里姆波-卡亚波，并雇用了其他的白人做工，付给他们利润的60%作为报偿。虽然卡亚波人得到的其余40%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这笔钱却没能发挥应有的效益。

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是1968年建立的，其宗旨是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由于巴西地域辽阔，在内地，这一组织的数量仍然不多。不少部落一直为本地的传教士代管，还有一些部落住进了政府兴建的象格罗太尔那样的村庄。

一天，一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向我讲述了卡亚波人和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和平队第一次遭遇的情况。他说：“我们打算杀死他们，可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东西：小刀、砍刀、斧头、饰珠和其他物品。所以，我们决定与他们讲和。”

巴西政府希望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能够成为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一种缓冲组织，所以为它配备了大量军事人员。在格罗太尔保留地，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使卡亚波人和外来者和平共处。然而，做好这项工作并非易事。

一位老战士讲了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战斗：“有21个外来人到保留地内非法开垦农田。政府制止不住，我们就去驱逐他们。我们抓住一个农业工人，把他的头发剪了，好让他接受教训。可这时，一个白人姑娘跑来帮助他，她刺伤了我的兄弟。另一个白人又用斧子柄打伤了我叔叔的头。于是，我们就把他们统统杀死了。”

这种暴力行为今后肯定还会发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大批的金矿勘探者首次到达保留地东部的弗兰斯科河。虽然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最初打算制止这种入侵，但是，1980年，金矿工人们跨过了地界，

一直扩展到印第安人的巴西坚果树丛林。若不是警察出面制止了这一侵略，保留地就不复存在了。1981年3月，库马鲁采矿联合企业成为合法的单位，它的总部就设在库马鲁矿，由巴西矿产局及联邦和军事警察共管。

库马鲁联合企业拥有2万名左右男工，它可以组织一支军队，其规模之大，是卡亚波人所不及的。目前，人们一直在谈论着要把矿工们的家属迁来，将他们安置在矿区附近的农田里做工。可采矿区的枯竭是可预料到的，新矿的勘探很可能要进一步侵占格罗太尔保留地的土地。

当我第一次飞往格罗太尔时，我曾漫步在水晶般透明的蓝色河流边，数百只黄蝴蝶在河畔起舞，宛如为大地铺上了一层地毯。而今，污浊的河水在其中流淌，没有一个印第安人在河里洗澡或捕鱼。这就是被矿区所污染的弗兰斯科河。在那条河流还没有被泥砂、污物和化学物质污染时，在那些欢乐的日子里，弗兰斯科河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可现在，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不得不从一英里以外的一条小河中用管道引水进村，使村民们能够洗澡、洗衣服和饮用。

非洲水牛对于外界强加给印第安人的发展，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一个印第安人告诉我：“我们不喜欢牛肉的味道，我们以前从来没吃过这种肉。”一个老人抱怨道：“现在，我们都不能在村子附近捕鱼了。用弓箭捕鱼，河水必须清澈。此外，鱼也没有嗅觉，在被污染的河流里，许多鱼都死了，又被水流冲到岸上。”

可悲的是，污染似乎成了发展的代价。我问村子里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负责人阿纳齐尔多·西尔瓦：“污水从金矿流出时，难道不能过滤一下吗？”他摇摇头说：“成本太高了。向库马鲁的官员们施加过压力，但没有结果。可不管怎样，他们已经答应为我们检修引水进村的塑料管道系统；他们还同意援助我们修建一个小水坝。”

开采金矿还产生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废弃的矿坑积满了污水，成为疟蚊的滋生地。

鱼类仍然是印第安人食物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是现在，村民们必须沿河而上，经过长途航行才能捕到鱼。一天，我和摄影师米格尔·瑞尔·布兰科同乘一只小船，去考察污染源离村子到底有多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经过三小时的艰苦奋斗，我们才沿河上溯了一英里半。我们到达了瑞尔-达-波恩特河口，在这里汇集了金矿倾入弗兰斯科河的污染流。以这一河口为界，弗兰斯科河上游河水清澈，鱼类也较为丰富。

目前，鱼钩和钓鱼线正在代替弓箭成为捕鱼的工具。但有时，印第安人用蒂姆波捕鱼。蒂姆波是一条藤蔓，把它束成一捆，便可漂浮在河上。男人们唱着歌，用树枝抽打蒂姆波，它产生一种物质，把鱼引到水面上，人们轻易地就捕到了鱼。

录音机与棍棒，铝制的餐具和茅屋顶——格罗太尔村的卡亚波人面临着新旧两种生活方式而彷徨不决。村子里有一所基督教堂，那里的各种宗教仪式都由本地的牧师主持。我参加了一次宗教仪式，传教士告诫人们，只有那些遵从上帝意旨的人才能上天堂，其他人都将在地狱中被烧死。对于来世，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不同于基督教。他们认为：一个人死后，将进入死者的村庄。在那里，人们白天睡觉，夜晚狩猎；老人们变得年轻，孩子们却成了老者。

作为一个非印第安人，我被允许进入传统的男子会所——男人的屋子。除了极偶然的情况，妇女一般只能在这里短暂停留，给自己的亲属送饭。在那里，我听到一种和教堂里完全不同的说教。村子里的一位老人说：“现在，我们卡亚波人都是兄弟。我们必须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和那些企图侵占我们土地的白人做斗争。”

卡亚波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和各种仪式相联系。每逢旱季或雨季，他们都举行五种最

主要仪式中的一种，为青年们授予部落祖传的名字，举行学习其他部落的舞蹈仪式或是祭谷仪式。

他们有一套丰富的合唱节目。夜间，在森林里，在辽阔的星空下，我和卡亚波人围坐在一起；伴随着蛙声和各种动物的啼叫，聆听着他们的大合唱，真令人激动不已。

我在格罗太尔村的18天里，正好遇上了贝姆普节，这是数年才举行一次的盛大的成年和命名仪式。按仪式的规定，男人们背着一根巨大的树干向村里走去，夜间跳舞时，这种树干将作为中央标志物。但按规定，日落以后，树干才能进村。整个下午，男人们只得在村外守着树干。为了消磨时光，他们吃着进口的甜饼，喝着罐头装的果汁。这与他们正在举行的仪式是多么的不协调。

这个村子为庆祝贝姆普节挥霍了大笔黄金收入，这笔费用超过了前几年来巴西坚果收成所得的收入。阿纳齐尔多·西尔瓦宣布说：“明年，我们将把黄金收入用作农业投资。”这一想法尽管具有实际意义，但却没有考虑到卡亚波人对于外界各种商品的热情。

格罗太尔村渴望与凯克里-图姆村竞争。1976年，村子里的首领为了某些仪式的服饰问题发生了争论，而后，争论逐步升级为首领之间的决斗。从那以后，凯克里-图姆村便分离了出去。这个村子在保留地的北部，由于金矿交易获利较高，村民的富裕引起了格罗太尔村的妒忌。实际上，那个村的首领波姆博无疑是得到了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军事人员的鼓动；他只对长官陆军上校唯命是听。

格罗太尔村民和兴古河上游的卡亚波人进行一些交易活动，那些人拥有许多工业品，却缺乏传统物品。两村交换的货物依靠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飞机运输。

人们问我，为什么最近交换的货物还没运到。“我们给他们送去了巴西坚果、鸚鵡羽毛和巴巴苏油，可是，我们一直还在等着

饰珠、弹药、镰刀和钓鱼线，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答应换给我们的。”

这两个村子里几乎没有人识字，他们完全不了解怎样运输货物，因此，两村之间的空中往来必然混乱不堪。

由于更为白人的商品所吸引，格罗太尔村的印第安人已经接受了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建议，修建一条通往库马鲁矿区的公路。一家外地公司将承担公路的建设，公司将得到从公路上砍伐的所有木材作为报酬。

许多印第安老人都担心那条公路的建设和公路修好后所产生的影响，可是青年们却很乐观。一个年轻的卡亚波人对我说：“飞机的运输能力有限，而且成本太高。有了公路，就可以用卡车运输了。我们可以得到录音机、衣服、食品……。”我问：“你不怕公路会带来更多的金矿工人和其他定居者吗？”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心思全都集中在公路将带来的各种商品上。他说：“哦，公路上设有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岗哨，设有大门。我们只让为这里送货的人通过。”

对此，我早已确认：通往巴西印第安人村庄的公路，对村民的影响总是弊大于利。

在我访问期间，格罗太尔村的上空非常繁忙。各种飞机经常在村子附近降落，我们整天都可以听到库马鲁方向的飞机声。军方人员、联邦警察、库马鲁的行政官员和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公职人员都经常到村子里视察。

两位首领卡霍恩克和托托伊都很反对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视察。卡霍恩克说：“我打算在路边立一块牌子，告诉那些警察，不要带枪进村。这里是我们的家。”

位于盖里姆波-卡亚波的卡亚波人自己的金矿企业，在我访问期间，正好开工。在库马鲁总部已经为它设立了帐户，所以这两个首领已经能够出售黄金。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为企业购买了采矿机械，他们雇了4名白人开机器。

卡亚波人已经赶走了原来的一批工人，因为他们总想窃取黄金。完全可以预言，这种冲突将继续下去。因为即使非印第安工人教给卡亚波人怎么做工，他们也未必愿意自己去完成所有那些紧张的工作。有一项计划是把格罗太尔雇用白人的数量限制在40人左右；但是，在黄金热的压力下，矿井再保持如此小的生产规模将是十分困难的。

在保留地内，还有其他两个大矿井——玛利亚-博尼塔矿和毗邻的塔赞矿。据西尔瓦介绍，卡亚波人正在接受联邦政府自玛利亚-博尼塔矿采金的一部分税收。

格罗太尔村的卡亚波人正在逐渐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设在村子里的小卖部向村民们供应如不商品：稻米、豆子、木薯面、糖、咖啡、甜饼、黄油和牛奶。

现在，村子里有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传教士的住房，此外，还有一家药店。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电台和外界保持日常联系。一些村民正在学习用他们自己的文字阅读和写作，其他人正在学习葡萄牙语，尽管大多数人学后就忘了。

格罗太尔村的两位首领甚至梦想把电扩大到全村使用，这可能将永远是个梦想。

尽管现代生活方式具有异质性，格罗太尔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它的高度发达的礼仪生活。绘身——这既是化妆又是一种象征——是一种传统的日常装饰。在成年人聚集的时候，人们互相涂色。妇女们花很长时间为子女涂色。他们用棕榈叶做刷子，以各种鲜果为染料，在身上和脸上画出醒目的黑色几何图案。他们把腿涂得象穿了一双长筒红袜子，把脸也涂成红色。图案是依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人的年龄和性别而变化的。卡亚波妇女还用很多珠子装饰她们的子女。

外部世界对于保留地的压力在继续增长。保留地以北，有巴西最大的金矿——塞拉-佩拉达矿。去年，在那里发现了重137磅的大金块，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金块之一。

巴西政府指出在矿井内进行手工操作是十分危险的，并威胁手工工人们，要关闭塞拉-佩拉达矿。报刊指出，国内较大的金矿仍在沉睡；政府和跨国公司打算通过机械化开采获取全部利润。目前，正打算把塞拉-佩拉达矿的8万名矿工迁往库马鲁矿。这个计划一旦实行，对格罗太尔保留地将产生更大的压力。在这同时，金矿工人们已经到达了保留地之外的两个卡亚波人村庄。

现在，还有一个兴建水电站的庞大远景规划。实施这一规划，将淹没兴古河畔两个卡亚波人的村庄。水电站建设所带来的发展对于卡亚波人的其他村庄也将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巴西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项耗资巨大的规划目前还只是纸上谈兵。

如此庞大的规划与刚刚脱离刀耕火种的自然社区相结合，这无疑是一世纪的一大奇观。卡亚波人一直居住在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区，他们经营农业、狩猎，还采集野果。首领卡霍恩克告诉我：“过去，我们总是离开村庄，穿过丛林，长途跋涉，以求生计。”而现在，由于依赖现代社会的商品，印第安人正逐渐趋向定居。

卡亚波人仅仅是由巴西许多部落所组成的混合体的一部分。据估计，目前印第安人的总数为15万人，其中包括大约180个部落，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语言。当葡萄牙人刚刚开始移民时，印第安人的数量可能高达300万。

十九世纪中期，橡胶业的繁荣，开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寻找橡胶树的潮流开始蔓延时，印第安人和白人入侵者发生了冲突。卡亚波人向白人进攻并杀死他们，用以报复白人对村子的突然袭击，并收集枪支弹药等战

利品。这个部落中有一部分人向西迁至兴古河畔，以求更远地躲避入侵者。但是，开发内地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是如此。1960年，巴西利亚成为巴西的首都，庞大的公路网络穿过丛林，把内地和发达的沿海地区连接起来。

1980年，建立了第一个印第安人组织——印第安人联盟。这样，印第安人就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两年以后，一个名为梅欧·朱鲁纳的印第安人被选入巴西议会。在他的任期内虽然充满了风波，但是对于这个国家受压迫的贫苦人民来说，他已经成为一种正义的象征。

在巴西，人们常说，印第安人是注定要灭绝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说法。的确，外界对于印第安人的压力正在增加；但是，倾向于自决的趋势也正在带来进步。例如：以上所谈到的印第安人联盟和梅欧·朱鲁纳。一些部落（包括卡亚波人）正在扩大。1983年上半年，在格罗太尔村就有23名婴儿出世。

但是，巴西所有印第安人的前途，仍然取决于他们的继续斗争；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地位，他们正在反抗外界所强加的各种发展。事情如果总象以往那样：保留地的边界继续受到侵犯，甚至经常变动，人们被迫离开他们传统的土地，那么，即使在森林里标出保留地的边界也是毫无用处的。

这就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正象巴西自身处于外债累累的困境一样，国内的印第安部落（包括卡亚波人）正在感受着世界性资源争夺战的日益增长的巨大压力。

（邓方摘译自《全国地理》杂志1984年第5期）